

套版印刷起源考

曹 之

套印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然而,关于套印的起源至今却是聚讼纷纭。本文列举大量事实,从学术基础和技术基础两个方面说明套印始于元代,成于明末。

什么是套印?套印是将图书的不同内容分别各刻一版,然后用不同颜色依次加印在一起的一种印刷技术。套印的产生标志着雕版印刷技术的重大进步,在印刷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套版印刷的国家,套版印刷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关于套印的起源问题,目前至少有三种说法:(一)辽代说,即认为套印始于辽代,根据是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发现的三幅彩印《南无释迦牟尼佛》,该佛身披红衣,头部光圈内红外蓝,“南无释迦牟尼佛”七字的底色是黄色。(二)元代说,即认为套印始于元代,根据是元至元六年(1340年)中兴路(今湖北江陵)资福寺刻印的无闻和尚注《金刚经》,该经经文红色,注文墨色;卷首扉画、松枝墨色,书案、方桌、云朵、灵芝、人物等均为红色。(三)明末说,即认为套版始于明代末年,根据是明末闵氏套印的大量图书。

以上诸说孰是孰非,我认为需要从套印的学术基础和技术基础等方面进行研究、讨论。

套印的学术基础

著作方式的多样化、评点的盛行是套印产生的学术基础。

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知识分子仕进的敲门砖。“十三经”作为封建社会的畅销书,经久不衰。经书的著作方式极为纷杂,注和疏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种。雕版印刷发明之前的儒家经典,一般都是本经与注疏分别抄写,单独发行。雕版印刷发明之后,直到北宋,儒家经典仍然是本经与注疏各自单行。到了南宋,为了阅读方便,书坊遂将本经与注疏合在一起。正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注疏旧本》所说:

唐人撰九经疏,本与注别行,故其分卷亦不与经注同,自宋以后刊本,欲省两读,合注与疏为一书,而疏之卷第遂不可考矣。……尝见北宋刻《尔雅疏》,亦不载注文,盖邢叔明奉诏撰疏,犹遵唐人旧式。谅《论语》、《孝经》疏亦当如此,惜乎未之见也。

除了把多种著作方式的内容合在一起之外,南宋还出现一种新的著作方式——评点。所谓“评”即评论,就是对书的内容发表意见,这些意见一般写在天头上,因此又叫“眉批”;所谓“点”,即圈点,就是遇到精彩之处,在字旁加上圈点,说明这些地方语意深刻,应当深思。评点虽

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它却很自由,常常能讲出大块文章难以讲到的妙处,寥寥数语,就能画龙点睛,因此颇受人们的欢迎。南宋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迂斋古文标注》、谢枋得《文章规范》等是最早评点的一批图书。宋末刘辰翁尤以评点著称于世。刘辰翁(1232~1297年),字会孟,号须溪,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词人,入元不仕。他先后评点过《老子》、《庄子》、《列子》、《班马异同》、《世说新语》、《孟浩然诗集》、《王摩诘诗集》、《李长吉歌诗》以及杜甫、苏轼、陆游等人的诗。刘辰翁是第一个对笔记小说进行评点的人,他对《世说新语》的评注开了我国评注笔记小说的先河。元代评点之法逐渐成熟,程端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对圈点方法作了具体规定。该书《勉斋批点四书例云》:

红中抹:纲、凡例;红旁抹:警语、要语;红点:字义、字眼;黑抹:考订、制度;黑点:补不足。该书《批点韩文凡例》(议论体)云:

一、句读并依点经法

一、大段意尽,黑画截(于此玩篇法)

一、大段内小段,红画截(于此玩章法)

一、一小段内细节目及换易句法,黄半画截(于此玩句法)

一、论所举所行事实及来书之目及所以作此篇之故,每篇首末常式,黑侧抹

一、所论援引他书及考证及举制度及举前代国名,青侧抹

一、所论纲要及再举纲要及或问体问目及提问之语及断制之策,黄侧抹

一、义理精微之论,黄中抹

一、凡人姓名初见者,红中抹

一、缴上文结上文紧切全句或发明于事实之下,或先发明事之所以然于事实之上者,红侧

圈

一、转换呼应字及用力字及缴结句内,虽已用红侧圈而字合比例者每字,黄侧圈(于此玩字法)

一、假借字先考始音随四声,红圈

一、有韵之韵,黑侧圈

一、造句奇妙者,红侧点

一、补文义不足,黑侧点

一、譬喻,青侧点

一、要字为骨初见者,黄正大圈

一、要字为骨再见者,黄正大点

实在繁琐之极。但既为程氏家塾学生读书所用,可见应用相当普遍,学生都要记住这些办法。该书还谈到了圈点工具的制作方法:

所用点子以果斋史先生法,取黑角牙刷柄,一头作点,一头作圈,至妙。凡金、竹、木及白角,并刚燥不受朱,不可用也(造法:先削成光圆如所欲点大小,磨平。圈子先以锥子钻之,而后刮之如所欲)。

元代方回亦喜评点,他所编唐宋诗选《瀛奎律髓》以评点的形式标榜江西诗派。明代评点之风最盛,杨慎、李贽、钟惺、孙矿等都评点了不少图书。杨慎(1488—1559年),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文学家。他先后评点有《晏子春秋》、《鬻子》、《关尹子》、《亢仓子》、《商子》、《邓析子》、《公孙龙子》、《鬼谷子》、《黄石公素书》、《谭子化书》、《草堂诗余》等。其批点方法见《杨升庵批点〈文心雕龙〉》卷端《与双禺山书》:

批点《文心雕龙》颇得刘舍人精意。其用色或红、或黄、或绿、或青、或白，自为一例，正不必说破，说破又宋人矣。盖立意一定，时有出入者，是自乖其例。人名用斜角，地名用长圈，然亦有不然者，如董狐对司马，有苗对无稼，虽系人名地名，而偏偶之切，又当用青笔圈之，此岂区区宋人之所能尽！

李贽(1527—1602年)，号卓吾(又号笃吾、宏甫等)，晋江(今福建泉州)人，文学家、思想家。他评点有《陶渊明集》、《王摩诘集》、《方正学文集》、《龙溪先生语录抄》、《于节庵集》、《杨椒山集》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贽大胆冲破封建士大夫对文学的传统偏见，大力推崇通俗文学，评点有《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琵琶记》、《浣纱记》、《金印记》、《绣襦记》、《香囊记》、《鸣凤记》、《西厢记》、《玉簪记》、《玉合记》、《西游记》、《幽闺记》、《红拂记》等一大批通俗小说。钟惺(1527—1624年)，字伯敬，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万历进士，文学家。他先后评点有《诗经》、《道言》、《辨言》、《术言》、《盐铁论》、《德言》、《文心雕龙》、《水浒传》、《封神演义》等。孙矿，字文融，号月峰，万历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他先后评点有《诗经》、《尚书》、《礼记》等43种著作。明代科举考试以八股文取士，“四书”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五经以宋元注疏为准绳。为了启导后学，四书五经的评点著作尤其泛滥成灾，四书讲章充斥天下。

总而言之，评点和合刻经注均始于南宋，评点至元代而成熟，至明代而极盛。自从唐代发明雕版印刷以来，用同一墨色印刷不同内容有诸多不便。天长日久，辗转传刻，很容易把各种批点混在一起；对于读者来说，黑糊糊一片，也不知重点所在。著作方式的多样化、评点的产生，向人们提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把不同著作方式(主要指正文和批点)加以区别呢？这样，套印的发明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套印的技术基础

古代印染和纸币雕造技术是套印产生的技术基础。

《诗经·豳风·七月》云：“七月鸣鴈，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扬，为公子裳”。这首诗说明先秦纺织品已是五颜六色，人们做衣服时特别注意选择颜色。印染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天大约五万年到十几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使用红色矿物染料。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使用植物染料。周代“染人”是负责丝帛染色的专门官吏。周代已经掌握了媒染和套染的方法。所谓“媒染”，即采用媒染剂进行染色，如茜草用明矾为媒染剂可以染出红色。所谓“套染”即采用多种染料依次加染，如染蓝之后，再用黄色染料套染而为绿色；染红之后，再用蓝色染料套染而为紫色；染黄之后，再用红色染料套染而为橙色，等等。秦汉时期染色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金银色印花纱是用三块凸版套色印染而成。由于定位不准，印花纱上间有叠印、疏密不均之处。另据唐代刘存《事始》转引《二仪实录》的话说：“夹纈，秦汉始有之。”夹纈是一种印花染色的方法，最早的夹纈染色法是用两块木板镂空雕刻同样花纹，把绢布对折夹在中间，然后在雕空处着色夹染成为对称的各色花纹。这说明早在秦汉时期已发明了镂空版染色技术。南北朝时期，夹纈工艺有了较大发展，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一个人用夹纈法印了400匹带有紫色花纹的丝绸向官府行贿，弄到一顶刺史的乌纱帽。隋大业年间，隋炀帝命工匠加工五色夹纈花罗裙数百件，赐给宫女、百官夫人等。唐代重视染织，规模越来越大，专门设立了管理染织的部门。唐贞观间设立染织署，管理包括6个练染作坊在内的25个染织作坊。唐代夹纈印染技术已经相当普及，据宋王说《唐语林》卷四：

玄宗柳婕妤有才学，上甚重之。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为夹缬，因婕妤生日，献王皇后一匹，上见而赏之，因敕宫中依样制之，当时甚秘。后渐出，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

唐代用夹缬工艺印染的屏风，花纹对称，极富美感。除了夹缬之外，唐代还有藤缬、绞缬、拓印等印染方法。敦煌发现的唐代拓印对窠对禽纹绢，是自东汉以后销声匿迹的凸版印花技术的再现。宋代依然盛行各种缬染工艺，据《宋史·舆服制》：

仁宗天圣二年诏：“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妇女不得将白色、褐色毛段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令开封府十日断绝……”

可见，缬染产品于宋流行甚广，官方明令禁止。徽宗时还禁止民间制造夹缬镂空印花板，商人不许贩卖夹缬花板。但是，由于缬染成风，官方屡禁不止。元代官方重视染织，各级官府都成立了主管染织的部门，属于中央的有工部大都染局、工部织染人匠提举司、将作院绫锦织染提举司等；属于地方的有冀宁路织染提举司、保定织染提举司、云州织染提举司、大同织染局、怀庆路织染局、杭州织染局、建康织染局等。据元张铉《金陵新志》记载，属于建康织染局的东织染局就“管人匠三千六户，机一百五十四张，额造段匹四千五百二十七段，”可见规模之大。明代染织工艺发展更快。官府设立颜料局专掌颜料，织物染色品种计有大红、红、水红、桃红、闪红、青、天青、黑青、绿、黑绿、墨绿、油绿、沙绿、柳绿、蓝、沉香、玉色、紫、黄、柳黄、白、葱白等数十种。染色工艺更为多样，单是夹缬一类就可细分为檀缬、蜀缬、锦缬、撮缬、玺缬、儿缬、浆水缬、三套缬、哲缬、鹿胎斑等九种方法。各地染色技术也出现百花争艳的局面，出现湖州染式、锦江染式等不同地方体系。具有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印染品也日渐增多。以上是明代以前染织业的大概情况。

纸币首先出现在北宋，当时称为“交子”。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也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宋代出现纸币既有经济原因，又有技术原因。就经济原因而言，交子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起源于唐代的飞钱。早在唐初，市场上还是钱帛并行，绢帛可以行使货币的职能，当时的商品交换在一定程度上还处在以物换物的发展水平上。唐代中叶以后，铜钱日益排挤绢帛，出现了飞钱。所谓“飞钱”，就是两地之间汇兑的票券，甲地的钱可执券在乙地汇兑。到了北宋，绢帛大体上已终止了货币的职能。当时铁钱、铜钱并行。铁钱是一种价贱而笨重的铸币，一贯钱重3.9千克。买绫罗1匹，须用20贯铁钱，共重78千克。商人如出卖10匹绫罗，得钱200贯，钱重780千克，须用大车来拖。铁钱笨重之至，对于买卖双方都不方便，于是纸币“交子”应运而生。交子可以兑换现钱，也可以流通。交子最早出现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起初仅由10几户富商发行，后来由于富商破产等原因常常不能兑现，诉讼纠纷叠出，因此到了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交子的发行工作由官府接收。由于纸张和印刷质量方面的原因，交子不能长期使用，而是分界发行，定期回收。正如《宋史·食货志》所说：

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后富民贫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

就技术原因而言，宋代雕版印刷初步繁荣，完全有能力雕造交子。早在宋初，四川就雕造《大藏经》5048卷，显示了雕版的雄厚实力。雕印交子对于四川来说，当然不在话下。交子、会子是怎样制造的呢？根据朱熹《朱文公集·按唐仲友第六状》、明曹学佺《蜀中广记》等书记载，其制造方法大约可分四道工序：（一）刻版。唐仲友伪造会子用的是“梨木板一片”，版面包插图案、出相

人物等。版面制作十分精细,方寸之版,需“十日雕造”。(二)印刷。(三)手写币值及官押字号,字号写在青色花卉图案之上。唐仲友伪造会子请能“传神写字”的贺选担任了这项工作。(四)铃印。印章共六颗,六印是什么颜色,《蜀中广记》与《朱文公集》说法不一:前者说是二墨一蓝一朱,后者说是“朱印三颗”,未知孰是。崇宁四年(1105年),交子易名“钱引”,除了闽浙等地之外,在全国各路发行。南宋除了钱引之外,还有河池银会子、两淮交子、湖广会子、铁钱会子、关子等多种纸币。南宋初期,民间通行一种便钱会子。绍兴三十年(1160年)改为官办,行于两浙等地,这种会子仍然采用一版套色印刷,上半部为严禁伪造会子的赏罚规定,并用大字标明发行机关为“行在会子库”。由于梨木质地不坚,官制会子多系铜版。金国纸币叫“交钞”。元代是古代纸币最盛行的时期,市场流通的货币除了银元宝之外,几乎全是纸币。明代初期沿用元制,用钞不用钱,禁用金银交易。后改为钱钞并行,以钞为主。洪武八年(1375年)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长36.4厘米,宽22厘米,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纸币。以上是明代以前纸币的大概情况。

印染纺织品、雕印纸币和套版印书虽然是三件不同的事情,但它们之间有联系。据《朱文公集·按唐仲友第三状》,唐仲友不仅刻书、伪造会子,而且“雕造花版印染斑纈之属”。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为什么唐仲友能够兼事刻书、伪造会子和纈染?因为印染纺织品、雕印会子和刻书三者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都离不开雕版、印刷两个最基本的工序。一个工人完全可以把印染、雕印会子、刻书三件事情全部兼起来,完全可能一身而三任。既然如此,刻工在刻书过程中,就会自然的把印染、雕印会子过程中的套印技术借鉴到刻书中去。套印图书接受来自印染、雕印会子方面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印染套印、雕印会子源于宋代或宋代以前,为什么宋代没有套印图书呢?有二个原因,一是宋末虽然出现了评点,但尚未盛行,宋代有套印图书的技术基础而无学术基础,因而不可能出现图书套印。二是宋代雕印会子属于套色铃印,与套版印刷是不一样的。

套印的起源

套印是在朱墨写本的启发下发明的。

公元前2世纪以后,我国陆续出现了很多传注之类的解释性著作,如《春秋》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春秋左氏传》又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史记》有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等等。为了便于学习,必须想办法把不同制作方式的内容用不同颜色加以区别。早在1世纪时,研究《春秋》的贾逵、董遇等人就已经用朱墨二色来写《春秋》的传注。7世纪初,陆德明《经典释文》也“以墨书经本,朱字辩注,用相分别,使较然可求”(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敦煌所出唐写本佛经也有用朱墨二色分写经注的,例如李隆基注《道德真经疏》,经文朱书,疏文墨书。以上朱墨抄本既能区别不同内容,又能给人以美感,一举而两得。雕版印刷发明以后,怎样发扬朱墨抄本的优良传统?成为人们长期探索的一个问题。套印的产生经历了墨版、一版套色、两版套印、多版套印等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同著作方式的内容均采用墨版印刷的形式。所谓“墨版印刷”,就是用单一墨色印刷不同著作方式的内容,其主要做法有:(一)用大字和小字把不同著作方式的内容区别开来,一般是正文大字单行,注文小字双行;(二)用阴文和阳文把不同著作方式的内容区别开来,如有人在刻印《神农本草经》时,用阴文表示经文,用阳文表示名医传注;(三)用加括号的办法把传注之类同正文加以区别。以上各种方法虽然保证了不同著作方式内容的完

整性,但是久而久之,传刻多次,很容易把正文同注疏混在一起,后人要做到“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段玉裁《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是很困难的,为古籍整理增添不少麻烦。而且用单一墨色印刷也远远不如朱墨抄本那样红黑分明,朱墨灿烂,既醒目又美观。于是,人们继续探索,找到了一版套色的印刷方法。

所谓“一版套色”是指在同一版片上依内容敷彩的印刷方法。1973年8月,陕西省文管会在修整《石台孝经》碑身时发现一幅《东方朔盗桃版画》,该画用墨绿等色印制而成,据专家分析,当是宋金作品。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版套色作品。直到明代,不少版画仍然采用一版套色的印刷方法。现在争议比较大的是元至元六年(1340年)中兴路资福寺元闻和尚注《金刚经》,有人说是双版套印,王重民先生认为是一版套色。他在《套版印刷起于徽州说》一文中说:

这个印本的经文是根据鸠摩罗什的译本,注解是资福寺僧思聪作的。正是采用了《经典释文》的方法,经文大字朱印,注解双行墨印。每页上的经文不到几个字。它的印法虽说使用了朱墨两色,但恐怕不是两版套印,而只是用一版涂上两种颜色印成的(当不是用一块版,涂两次色,印两次)。这是朱墨印法第一次创造性的试验,是朱墨套印法的发明必须经过的阶段。从这样的试验和实践过程中,自然能够提出新的启示和更进一步的追求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部朱墨印本是用套版印刷的。但我认为由于这个印本的本身显示不出套印的痕迹,就每页上仅有的几个红色大字看来,反倒强烈的显示出可能是用一版涂两色印成的。《安徽历史学报》1957年创刊号)。

台湾昌彼得先生对原件进行研究之后,在《元刻朱墨本〈金刚经〉题识》中说:

惟就此印本细察研究之,实系一版而先墨后朱分两次印成。

王、昌二氏虽对印刷次数有不同看法,然“一版套色”之见则不约而同。考江陵为宋荆湖北路治所,于元为中兴路治所,四通八达,如无闻和尚注《金刚经》果为两版套印,则这种印刷技术当会很快传遍全国。然而,事实是直到17世纪初年才出现真正的两版套印作品,中间二三百,无声无息,这就说明该书似非两版套印。又江陵刻书历史悠久,宋代江陵荆湖北路安抚使司刻有《建康实录》、江陵府先锋隘李安松刻有《大方广佛华严经》、江陵郡斋刻有《项氏家说》等书,元代中兴路儒学刻有《春秋比事》等书。如无闻和尚注《金刚经》果为两版套印,则江陵本地书商当会捷足先登,首先采用这种印刷技术,然而事实是两版套印肇于浙江,而非江陵,这也说明该书似非两版套印。一版套印虽然比墨版有所进步,但敷彩极烦,必须慎之又慎,圈点敷彩,尤为费力。因此,这种方法并没有推而广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评点著作仍然采用墨版印刷的形式,例如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奇字馆刻杨慎批点《振秀集》、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华云刻杨慎批点《禺山七言律诗》、明万历年(1573年)刻慎蒙批点《皇朝文则》、明万历九年(1581年)刘怀恕刻穆文熙《批文明诗》、明万历二十一年(1597年)梅庆生刻《批点〈文心雕龙〉音注》、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刘龙田刻钱谦益评点《唐诗选玉》、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龚少山刻陈继儒评点《春秋列国志传》等均均为墨本。其中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梅庆生刻《批点〈文心雕龙〉音注》采用各种符号代表圈点颜色,此书刻于南京。南京地处交通要道,刻书历史悠久。如当时果有两版套印,梅氏定会采用。既然梅氏以符号代替圈点颜色,那就似可说明当时尚无两版套印之法。尽管梅庆生花样翻新,标新立异,但他用的仍然是墨版印刷,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评点著作的印刷问题,于是人们继续探索,直到20多年后,才发明了两版套印的方法。

两版套印在技术上至少有下列三项要求:第一,两版的版式、行格、字体必须绝对一致,否

则加印在一起,就可能驴头不对马嘴。第二,套印时要特别注意版片的卷页顺序,必须一一相对,否则圆凿方枘,不能浑然一体。明凌森美朱墨本《选赋》就有过这样的错误,该本有签记云:

卷四第五十一页套版,错用在五十二页;五十二页套版,错用在五十一页,俱改正。改字一百零七个,添字二个,删字十四个,添圈一百零七个,删圈十二个,添点八十八个,删点十一个,加方框一个。

第三,套印时除了卷页一一相对之外,还要做到行次、边栏相对,否则就会造成叠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吴兴闵齐伋刻《春秋左传》是我国最早的朱墨套印本,闵氏在凡例中说:

旧刻凡有批评圈点者,俱就原版墨印,艺林厌之。今另刻一板,经传用墨,批评以朱,校讎不啻三五,而钱刀之靡,非所计矣!置之帐中,当无不心赏,其初学课业,无取批评,则有墨本在。

考闵齐伋(1575—?年),字及五,号寓五,晚年自号“三山伋客”。诸生出身,曾竭50年之精力,著《六书通》一书,成书那一年,已逾82岁。闵氏一门除了闵齐伋以外,还有闵齐华、闵光瑜、闵迈德、闵洪德、闵昭明、闵元衢、闵映璧、闵象泰、闵无颇、闵振业、闵振生等,他们都刻过书。其中以闵齐伋最著名。闵齐伋刻有朱墨本《东坡易传》、《老子》、《庄子》、《列子》、《楚辞》、《陶靖节集》、《韦苏州集》、《王右丞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孟浩然集》、《花间集》等。闵齐伋刻印《春秋左传》的第二年(即万历四十五年),在朱墨本的基础上又刻出三色本《孟子》,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又刻出三色本《国语》和《战国策》。尽管多版套印与两版套印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多版套印是在两版套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版套印在前,多版套印在后。

总而言之,套印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学术基础和技术基础二者不可或缺。学术基础是必要性,技术基础是可能性。只有必要性而无可能性,就不能把理想变为现实;只有可能性而无必要性,再大的发明创造也不过是一堆废物。辽代彩印的南无释迦牟尼佛像是套版印染品,而不是套版印刷品,印染和印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尽管二者有许多相通之处。从技术上讲,南无释迦牟尼佛像采用的是传统的丝漏套版印染技术,印前首先制作漏板,印时将绢对折,按照不同部位,分别填上红、蓝二色,然后将绢面展开,就成一幅左右对称的佛像。由于漏印之法不易印出精细的线条,所以佛像的体形、衣着不甚清晰,有些地方留下手工涂抹、勾画的痕迹。从学术上讲,南无释迦牟尼佛像印制于辽代统和间(983~1011年),相当于北宋早期,当时还没有经注合刻,也没有出现评点,因而缺乏发明套版印刷的学术基础。另外,如果南无释迦牟尼佛像真是套版印刷,为什么对以后的数百年没有发生任何影响呢?元至元六年(1340年)中兴路资福寺一版套印的《金刚经》虽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套印,但它开了套版印刷的先河,可以看作是套版印刷的初级阶段。明末闵氏首次采用双版套印,从此,套版印刷技术便进入成熟阶段,套版印刷乃逐渐遍及天下。

(责任编辑 江 平)